

编号: NO.6

钓鱼台档案

中国与欧、拉美、非洲国家之间重大国事揭秘



下

红旗出版社

99651
DH19/20
钓鱼台档案

DS2
8.5

NO. 6

中国与欧、拉美、非洲
国家重大国事揭秘



《钓鱼台档案》丛书编写组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钓鱼台档案/《钓鱼台档案》编写组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8

ISBN 7-5051-0269-9

I. 钓… II. 钓… III. 外交-概况-中国-现代 IV. 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806 号

钓鱼台档案(NO.1 – NO.6)

——NO.6 中国与欧、拉美、非洲国家重大国事揭秘(上、下册)^{49.80}

编著者 本书编写组

封面设计 杨群 李栋

责任编辑 毛传兵

版式设计 曾繁正 刘进

红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邮政编码:100727

(北京沙滩北街2号)

河南省沁阳市印刷厂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 48插页

1998年9月北京第1版

170印张 3000千字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 – 10000 套

定价:298.80元/套(全套共六卷)

每卷 49.80(上、下册)

ISBN7-5051-0269-9/Z·8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下
篇

中国
与拉丁美洲、
非洲国家

《钓鱼台档案》NO. 9

第三章

兄弟携手情谊深 中欧友谊万年青

第一节 怒对千夫无义指 不辞万里访真情

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各次大会上，罗马尼亚仗义直言，多次打退苏联猖狂反华的气焰。中美关系解冻时，齐奥塞斯库主动请缨，在中美之间搭成了“罗马尼亚渠道”。

周恩来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是罗马尼亚的中央书记，周恩来无限深情地说：“罗马尼亚同志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邓小平对齐奥塞斯库说：“中罗关系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苍劲’”。齐奥塞斯库被杀后，中国理智地说：“我们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

铁托顶住苏联的压力，毛泽东称赞他像铁一样坚强，1977年，铁托以85岁高龄不辞万里来华，使中南的纠葛随风而逝。

东欧剧变 天涯海角共建友谊万年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 50 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和东欧大多数国家关系也日渐疏远。但中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经受考验后却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同阿尔巴尼亚之间长期存在友好关系，但到 70 年代也出现了很大波折。

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两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外来干涉、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早在 1949 年 10 月 3 日，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事致电周恩来，两天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50 年代初，罗马尼亚支持中国抗美援朝，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50 年代末，中国遇到暂时经济困难，罗马尼亚向中国提供了石油及其钻探设备，派专家帮助中国发展石油工业。在 1960 年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和 51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谈中，对赫鲁晓夫公然围攻中国代表团，罗马尼亚很早就有了警觉，反对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突然袭击，支持中国代表团同赫鲁晓夫进行斗争。后来罗马尼亚坚持平等处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旗帜鲜明地抵制苏联对中国的围攻。1965 年罗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中央召开的三月反华会议，中罗在共同斗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更加巩固。1966 年 6 月 16 日至 24 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应邀访罗，在各地都受到罗人民的夹道欢迎，周总理同齐奥塞斯库、毛雷尔等进行五次会谈，就双边关系、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等问题进行亲切诚挚的会谈，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1969 年 6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齐奥塞斯库仗义执言，反对苏联猖狂反华。

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罗两国两党关系经历激烈动荡事件的考验,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发展。1971年6月,齐奥塞斯库应邀访华。周恩来总理同齐奥塞斯库进行了多次亲切友好的会谈。周恩来在欢迎大会上热情洋溢地说:“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声援;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得到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帮助。罗马尼亚一贯主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谴责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罗马尼亚同志可以相信,在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在你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始终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中罗两国还发表联合公报,旗帜鲜明地表明两国在国际共运等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一致意见。

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罗马尼亚起了值得称道的桥梁作用。

1970年10月,齐奥塞斯库赴美参加了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后,应邀对美国进行两个星期的正式访问。尼克松总统利用同齐奥塞斯库会谈之机,建立了旨在中美建交的“罗马尼亚渠道”。

尼克松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晚宴上耐人寻味地向中国发出公开的外交信号。尼克松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不久,齐奥塞斯库回到布加勒斯特,立即派副总理勒杜列斯库前往北京传达尼克松的信息。

周恩来得到尼克松传递的信息,马上通过罗马尼亚渠道愉快地表示:如果尼克松来北京将受到欢迎。齐奥塞斯库立即把中国的这一重要信息通过罗驻美大使博格丹,秘密转告给基辛格。

基辛格询问,中国是否把美台断交视为中美建交的先决条件,博格丹说他个人的感觉是“中国总理实际上是建议白宫考虑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折衷方式,而不是告诉美国应该做什么”。

通过罗马尼亚渠道的秘密往来,中美两国关系得以顺利地建立

和发展。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接见了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耶·维尔德茨，周总理怀着无限深情向客人说：“我已病了，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罗马尼亚同志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周恩来拖着重病之身，吃力地请维尔德茨转达他对齐奥塞斯库、波德纳拉希和罗马尼亚党政领导其他老同志的问候，并询问了波德纳拉希同志的健康情况，特别请维尔德茨告诉齐奥塞斯库，中国共产党成立55年来，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关于当时的情景，目击者、周恩来的摄影记者杜山在《红墙里的瞬间》一书中有如下的精彩描述：

1975年9月7日上午，周恩来在305医院留下了他外交生涯的最后的瞬间，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随之而落下光辉灿烂的帷幕。

谁见了这张照片不悲伤？不感慨？不动容？

周恩来用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支撑沙发边沿，左肘抵在沙发扶手上，为尽可能缓解腹部伤口未愈合而带来的剧痛，他上身艰难地向前微倾，凝神听着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谈话。他刀剑般锋利的浓眉拧着，眼睛却依然明亮。

病魔侵害了周恩来这位被人誉为东方美男子的儒雅阳刚的容貌，却没有改变他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从容不迫的笑容。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日子。

那天，我在医院的客厅里拍摄，无形的压抑和无以名状的痛楚，堵得心里老是发慌，焦距在微微颤抖的手里老

是模糊，他那潇洒而又庄重的形象曾千次万次出现在我的镜头里，也永远地留在了全国人民的心中……

可眼前的总理却已经十分瘦弱和憔悴，从不要人搀扶的总理，哪怕是大手术之后，身体还未复原，也要坚持自己走上前和外宾握手，而这次他已不能独自走完这段只有几米的平坦之路。

我几乎是从泪水模糊的取景框里看准了这个催人泪下的瞬间，按下快门。

就在我按下快门的瞬间，心底掠过不祥的惊悸，这会不会是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会谈时间不长，我看见总理的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右手握拳紧紧支撑沙发边沿，我心里真着急，会见应该结束了，好让总理早一点休息。幸好外宾站起身同总理告辞……

1978年5月，齐奥塞斯库又一次访华，同中国方面探讨国际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1982年4月，齐奥塞斯库又一次访华，与邓小平进行了会谈，签订了经济、文化协定，中国领导人对齐奥塞斯库说：“中罗关系是在波涛汹涌、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发展起来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苍劲’，实际生活证明，中罗两国走的是团结、合作的道路，而且团结、合作得越来越密切。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看法上的分歧，但无论如何，我们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一致，是主要的，是把我們紧紧连结在一起的根本所在。”1985年10月，齐奥塞斯库第四次访华，把中罗关系推进到新阶段。

1986年7月，中国总理访罗，同齐奥塞斯库总统、德斯科列斯库总理友好会谈，中国总理说：“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团结与友好合作关系非同一般。这种建立在独立自主、相互

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正确原则基础上的友好合作关系，经受了历史的风风雨雨的考验，变得更加牢固。加强和发展同罗马尼亚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罗两国的经济关系也有很大发展，中国曾多次给罗提供经济援助。继1958年两国签订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之后，1971年签订了第二个长期贸易协定。1978年，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长期协定，签署了中罗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82年，两国又签定了关于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长期纲领协定及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推动中罗关系全面发展。

1991年1月，罗总统扬·伊利埃斯库应邀访华，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会谈，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发展两国间业已存在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这正是：

中罗相交友情真，久经风雨几度春。

独立反霸互支持，海角天涯若比邻。

再说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几十年来，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变化。

1949年10月5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宣布承认新中国。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中国未同南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12月4日，周恩来外长致电南外长，表示欢迎中南建交。1955年1月2日，南外长复电表示同意建交。

中南建交后双方来往密切，1958年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严重分歧，中南关系出现曲折，两党关系中断，双方互撤大使，只保留临时代办关系，但南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6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出现的新变化，中南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原望，很快互派了大使。

1971年年初，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纳科维奇随南

外长访华，就国际关系、中南关系采访了周恩来。1971年6月，南斯拉夫外长特帕瓦茨应邀访华，同姬鹏飞代理外长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总理会见南外长并进行友好的谈话。李先念副总理举行欢迎宴会，他在欢迎宴会上说：

“近年来，南斯拉夫人民顶住了外来的压力，同超级大国的干涉、颠覆和侵略威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南斯拉夫这种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中国人民表示钦佩。南斯拉夫朋友可以相信，你们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可以指望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从此，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1975年10月，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访华。毛泽东会见了她，赞扬铁托不怕压迫，像铁一样坚强，多次问候铁托总统。邓小平也指出，中南两国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是相同的，类似的，中南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取得良好发展，正面临着广阔的发展前景。1977年5月，中国人大代表团和中国老战士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受到铁托的接见，为铁托访华铺平了道路。1977年8月底，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主席铁托不顾85岁的高龄，不辞万里来中国访问，是中南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受到中国人民热烈而隆重的欢迎。

铁托的脸上露出真挚的深情，挥着手保证南斯拉夫人民永远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和尊敬的感情，对中国人民失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表示深切的同情。

中国总理说：“中南两国都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遵守独立、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原则。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方面，目标一致，利害相同。至于双方在某些实际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和做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增进了解，但不强求一致。”

铁托不愧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神态庄重，严肃认真地说：“我们两国通过非凡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决定了各自的命运。在不同

的条件下，两国都进行了真正的革命，这一切是进一步发展中南关系与合作的重要的积极的条件。总之，不愉快的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铁托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恢复两党关系，中方主动提议，铁托表示同意，使铁托访华更加丰富多采。

1978年8月，华国锋主席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决定成立副总理级的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

此后，中南关系得到迅速稳定的发展，邓小平1981年11月对南《信使报》记者说：“中南两国历史上的一些纠葛统统过去了，剩下的就是很好地发展两党和两国关系，发展政治，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我们的合作没有任何障碍，我们的心是相连的。”

再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中阿两国于1949年11月建交。建交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友好状态。在1960年的51国共产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带头围攻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挺身而出，反对苏联的高压做法。阿尔巴尼亚一直带头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巨大的压力，甚至不惜同其断交。中国严肃批评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周恩来总理三次访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两次访华，部长会议副主席巴卢库等也多次访华，使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在发展中阿两国的关系中，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笔经济援助。

从70年代开始，我国对外政策做了必要调整，阿尔巴尼亚对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不满，开始影射攻击中国。1975年，当中国难以完全满足阿在援助方面提出的过高要求时，阿尔巴尼亚便从1976年开始把与中国的分歧公之于世。阿尔巴尼亚对铁托1977年访华更加不满，进一步恶化中阿两国关系。

1978年6月，中国外交部照会阿方，建议通过交换意见解决分歧，但阿方却拒绝接受照会。在此情况下，中国只好在同年7月终

止向阿方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接回在阿工作的中国专家，双方只保持外交关系。直到 1983 年才开始恢复贸易关系，次年开始签署贸易协定，贸易额逐年扩大，中阿各方面的接触逐步增加。1985 年 4 月霍查病逝，李先念主席和中国总理联名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发了唁电，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前往阿驻华使馆吊唁时郑重表示，中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贯怀有友好的感情，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和发展同阿的关系。近年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两国增加了往来和接触，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这正是：

欧亚万里各西东，团结友好心相通。

任凭东欧风云变，诚挚友谊万年青。

(李连庆：《新中国外交演义》)

八十年代东欧问题回眸

苏联解体出乎世界上所有政治预言家的意外。即使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的领导人，当他们于 1991 年 12 月 8 日在明斯克协定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前，也不曾预见到，是他们的三支笔敲响了俄罗斯大帝国的丧钟，扭转了战后世界历史的进程，令全世界为之瞠乎其后。

可是，发生在那之前的东欧剧变则不然。多年来，凡是系统追踪东欧形势的人，都早已开始预感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演变，或早或迟将发生某种变故，虽然关于如何变和何时变的具体概念，当时还很难廓清。六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摆脱东方集团而转向西方，人们虽然对事件发生的速度和规模曾惊愕不已，但事件本身并不完全出乎知情者的意料。

○ 间谍事件的启示

年轻时看问题简单化，曾真的以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磐石”。随着阅历的增添，逐步意识到，苏联和东欧各国间存在巨大差别和裂缝。早在 50 年代，我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结识了一批东欧学生，同他们的交往使我增长了对东欧国家的见识。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几点是：东欧国家比苏联先进、发达，东欧学生的穿着、用品比苏联的讲究、精致得多；东欧人性格开朗，言谈自由、风趣，不像苏联学生那样拘泥和好为人师；对苏联人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他们总是或软或硬地顶回去，例如，对莫斯科不喜欢的东欧领导人，他们就大加赞扬，有时还与苏联学生展开争论。我发现，在东欧人和苏联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隔阂，根源就是民族意识。因为我们中国学生也有这种感情，所以很容易发生共鸣。

1956 年爆发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我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对我了解东欧和苏联相互关系的实质以及思考问题的能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启迪作用。60 年代在布加勒斯特工作时，我看到了罗马尼亚是如何顽强抵制苏联意志的。对于后来发生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过几年就爆发一次的波苏关系危机，一直到团结工会事件，我思想上已不再感到茫然了，而且开始预见到事情还远未终结。

80 年代初，驻莫斯科使团透露出—个后来得到证实的传闻：在波兰军队统帅部工作的库克林斯基上校，长期向美国提供苏军核心机密，败露后，库克林斯基顺利地携眷逃往美国。这件事虽使苏联当局惊心动魄，但在波兰是另一种反应。很多波兰人并不把库看作叛徒、间谍，反而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因为他出卖的是苏军而不是波军情报，他们认为苏军是占领者。这件事之所以令人难以忘怀，是因为它具体地映现了东欧人的一种心态。

以上经历使我形成一个基本看法：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是最神圣的东西，任何外来控制，即使是以社会主义或国际主义名义，也不可能永久化。尽管苏联给予了东欧国家好处，但要害是损害了人

家的主权和民族自尊。二战后东欧国家的独立自主倾向从来没有泯灭，而且一有气候就会高涨起来。80年代初，这种气候又一次笼罩在东欧大地上。

○ 东欧自主倾向新高潮

1984年，我调任驻民主德国大使。次年，使馆送回一篇论述东欧国家独立自主倾向新高潮的报告，提出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正在出现独立自主倾向新高潮，列举了各种表现，从历史上论证了这种倾向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自然，我们当时并未预见到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的前景，但阐述了它们疏远苏联和向西方靠拢的趋势。报告的大意是，它们都是小国，在东西方对抗情况下，不可能在夹缝中保持完全的独立，不依靠东方大国就得依靠西方大国。东欧在历史、文化、传统上更接近西欧，目前，西欧经济发达，东欧有求于西欧，西欧又在千方百计进行颠覆，等等。

1985年11月第六次使节会议时，我就东欧独立自主倾向问题在全体会议上发了言。发言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分组讨论会上，不止一个发言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苏联和东欧之间只能说是存在差异，谈不上倾向。东欧问题成为使节会议上议论较多和分歧较明显的一个问题，以致部领导在总结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段，肯定了我讲的基本思想，同时指出东欧的自主倾向还没有像西欧对美离心那么显著。

在研究一个新出现的事物时，出现异议是很自然的，意见的不同主要在于评价形势的分寸上。不过毕竟已是80年代中期，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使节会议之后，驻外使馆关于东欧与苏联矛盾在发展的调研报告日见增多。1986年底，驻民德使馆的形势总结再次写了东欧问题，进一步分析了东欧国家向西方靠拢趋势的新发展。

○ 在东欧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东欧国家对苏联离心倾向加剧，并不是在1985年首先发现的。

我体会，中央领导在 80 年代开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多次提出，勃列日涅夫晚期莫斯科的指挥棒已开始失灵。团结工会事件搞得那么严重，苏联未像对 1968 年捷克事件那样对波兰动用武力。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情况变了。新局势的出现，为我国调整东欧政策提供了条件。不久，我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两个有分量的行动，1983 年派副外长和苏欧司长分头访问东欧国家是其中的第一个。

1982 年我到苏联东欧司任司长。当时意识到，中苏关系虽有松动迹象，但移步维艰，不能操之过急，苏欧地区工作局面的开拓，势必要先从东欧国家入手。苏欧司反复研究，认为可采取主动，但动作不可很大，能适当表明我方善意姿态即可。年底，在吴学谦部长主持的一次部务会议上，我代表苏欧司提出了请主管苏欧地区的钱其琛副外长访问民德、波、捷、匈、保的设想。钱副外长当时不在国内，事后我向他汇报，他当即首肯。不久，部领导同意了苏欧司的建议，并上呈了请示报告。

后来是这样落实的：钱副外长去了民德、波兰、匈牙利，我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1983 年四、五月之交分头成行。

东欧国家同我交恶 20 多年，相互间久不来往，国家关系仍未脱离冰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外交上采取的主动行动很是引人注目。上述各国心里欢迎中国官员到来，但不愿公开发邀请，我方也不宜勉为其难，因此我国副外长和司长是以我驻在国大使客人的名义分别往访的。我在保、捷受到友好接待，除了住在使馆之外，会见、宴请、参观，均按例行的外交礼仪进行安排，与相应级别的正式工作访问并无差异。

访问的核心部分是会谈。虽说东欧对苏联的离心倾向在发展，但当时还只是一种趋势。中国作为第三者涉足其间，如何掌握分寸，属于很微妙的策略运用。主人怀有造成远苏近华之虞，我们也要避免蒙受挑拨离间之嫌，这种心理因素是决定做法的主要依据。会谈的结果表明，我们的分析是准确的，做法是适宜的。在会谈过程中，保、捷两国的心态一致，但表现不同。在索菲亚，对方先不

表态，一上来就提出一串问题进行试探；在布拉格，主人不容我们开口，争先摆出自己的立场，暗示我们在敏感之处（主要是捷苏关系）免开尊口。我方发言开宗明义，说明访问目的在于增加相互了解，改善两国关系；强调中国的政策是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中国不同别国结盟，也不反对别国实行结盟政策，中国愿同捷（保）改善关系，也愿同苏联改善关系，等等。一席话说完，对方的狐疑和有点紧张的气氛顿时为之一扫，取而代之的是那种东欧人的友好热情。及至副外长会见、宴请我们时，再也听不到刺耳之音了。

这次访问标志着中国、东欧国家关系解冻的开始。之后，民德和波兰的副外长、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主管司长、匈牙利的首席副总理相继回访中国。不同的是，他们都是应我方的正式邀请来访的。

○“贺电外交”的出台

沿着国家关系正常化道路迈出第一步之后，紧接着就是如何处理关于确认东欧五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这件事之所以必要，并非因为我们要以意识形态划线，中国早就不搞这一套了，而是因为对方重视这一点。在论战年代，我们曾给五国贴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标签，而他们从未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等着中国的认同。不打开这个结，顺不了气，就谈不上关系正常化。所以早在筹划去访问时，也已开始酝酿这个问题的解决。然而这是一个政治性更强、敏感性更高的问题，必须在方式和时间上进行精心选择。

根据部领导指示，苏欧司不止一次地进行研究，我本人多次跑过钱副外长办公室汇报、请示、讨论。曾设想过几种办法，例如，由什么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某种方式将五国排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列，但均嫌欠妥。1983年底，最佳方案终于形成：发贺电时在电文中以含蓄的口气带上一笔，顺乎自然地表明中国仍把他们看作社